



杜预《春秋经传集解》研究

A Study on the *ChunQiuJingZhuanJiJie* of DuYu

方 韜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

杜预《春秋经传集解》研究

A Study on the *ChunQiuJingZhuanJiJie* of DuYu

方韬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杜预《春秋经传集解》研究 / 方韬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17. 6
ISBN 978 - 7 - 5203 - 0240 - 1

I. ①杜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春秋时代—编年体②《左传》—研究
IV. ①K225. 0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94601 号

出版人 赵剑英
责任编辑 史慕鸿
责任校对 王佳玉
责任印制 李寡寡

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
邮编 100720
网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发行部 010 - 84083685
门市部 010 - 84029450
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
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
版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
印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10 × 1000 1/16
印张 31.25
插页 2
字数 560 千字
定价 128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
电话:010 - 84083683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

出版说明

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，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，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。它是经过严格评审，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。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，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，促进成果转化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“统一设计、统一标识、统一版式、形成系列”的总体要求，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。

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

序 从著述行文的法度说起

方韬博士的专著《杜预〈春秋经传集解〉研究》，即将付梓刊行，嘱予为之序，并提前惠寄全书定稿，使我先睹为快。通读全书，受益匪浅，感慨良多，仅就著述行文的法度略陈己见，作为该书的序言。

杜预的《春秋经传集解》，在《春秋》《左传》学术史上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，对它的研究已经推出许多重要成果，继续拓展有较大的难度，但仍有多个可供选择的切入点。综观方韬博士这部专著，作为全书核心部分的第三、四章，集中探讨《春秋经传集解》有关凡例的论述和运用，可以说是切中肯綮，触及问题的要害，研究对象具有高品位的学术价值。作为研究古代文献的学者，能否在解读、阐释原典的过程中，提升到梳理凡例的高度，很大程度上是检验学术能否达到炉火纯青的标志之一。章太炎先生对清代高邮王念孙、王引之父子的学术成就予以充分的肯定。同时，又对他们在义例发凡方面未能建立起体系而感到遗憾。俞樾作为章太炎先生的业师，则在这方面实现了历史性的超越。他的《古书疑义举例》一书，是自觉地建构凡例体系的成功之作，在学术史上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但是，完整周密的凡例体系的建立，并非容易之事，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实现，有的领域甚至不是单独个人能够完成。继俞氏的《古书疑义举例》之后，刘师培、杨树达、马叙伦、姚维锐诸位先贤，又相继推出《补》《续补》《核录》《增补》等力作，在建立凡例体系方面功不可没。杜预的《春秋经传集解》，最主要的学术价值，就在于自觉地建构发凡体例的完整体系。他不但梳理出《左传》解释《春秋》的“五十凡”，而且还撰著《春秋释例》十五卷，同时，他对自己所作注释的行文也建立起凡例体系，以句末“他皆放此”加以标示。所谓的凡例，指的是从事著述、进行表达的准则、法度，所涉及的是带有规律性、普遍性的因素。而学术研究所追求的理想境界，就是从个别、特殊的对象中，揭示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。就此而论，对于著述行文的法度进行研究，又具有方法论的意义。方韬博士这部专著把关注的焦点锁定在对凡例的研究，是高起点、高

2 杜预《春秋经传集解》研究

难度的学术抉择，从中可以看出他的胆识和魄力。

通常情况下，对单独个人的学术著作进行研究，要对著者的基本情况进行介绍。方韬博士的这部专著也不例外，上编第一章“杜预的生平与著述”，就属于这方面的内容。在叙述杜预生平的重大建树时，提到他参与完成《晋律》的修定。杜预还严格区分“律”和“令”两个概念，使西晋的律法更加清晰而富有可操作性。因此，杜预注解的《晋律》一直被南朝所遵奉，号称杜律。这部专著还提到杜预受诏制定官员考核制度，首倡谅闇的丧服制度，还向朝廷上奏《二元乾度历》。杜预的著述则有《丧服要集》《律本》《杂律》等。通过上述介绍可以看出，杜预虽然不属于法家人物，却是一位法度之士，做事讲求章法、规则。由此看来，他注释《春秋》《左传》，致力于建立完整的凡例体系，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，是他崇尚法度的理念在著述中的体现。这就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，就是在进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，应该关注人的理念如何转化为精神产品的内在结构和外部形态。比如，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人物，他的文章不仅思想内容渗透法家观念，而且行文也有森严的法度，遵循既定的规则。可是，人们对韩非所作的文学研究，习惯于探讨文章所表现的法家思想，沿袭的是从人物思想到文章思想进行描述的理路。而韩非法家理念向行文法度方面的转化，则往往被忽略。方韬博士的这部专著，已经注意到杜预对法度崇尚的一贯性，第二章的相关介绍，为后几章对杜预建构凡例体系所作的论述作了铺垫，客观上展示出杜预的法度理念转化为著述行文法度的轨迹。

杜预梳理出《左传》解释《春秋》的“五十凡”，同时，他所作的注释也建立起凡例体系。这又提出另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，即研究对象有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同化研究者。研究对象看似处于被动状态，但是，它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研究者，使对方按照研究对象的形态、属性打造精神产品。这种情况较为常见，是一种有趣的现象。方韬博士的这部专著，把杜预《春秋经传集解》的凡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，那么，方韬博士的这部专著，是否也在建构凡例，在著述中是否有法度可循呢？这需要对他的专著进行多角度的审视。

先秦时期的礼法度数，往往与形名联系在一起。所谓的形名，就是探讨实际存在与名称的关系，循名而责实。杜预的《春秋经传集解》阐释凡例，采用的正是循名责实的方式，是这部解经著作所遵循的重要法度。方韬博士的这部专著，第二章第二节专设“《集解》辨名”栏目，用以辨析《春秋经传集解》书名的含义，是在进行循名责实。在把杜预这部著作与何晏的《论语集解》、郑玄的《毛诗笺》等进行对比之后得出结论：“应

从陆德明、孔颖达说,《集解》实为集合经传做解。”所给出的结论是正确的,合乎《春秋经传集解》这部著作的实际情况。何晏的《论语集解》,集解二字是动宾结构,表达的是集善之义。杜预的《春秋经传集解》是一个“把”字句,其中的集和解是并列关系,均作动词用。书名表达的意义,指的是把《春秋》《左传》两部著作集合在一起并且加以解释。方韬博士这部专著,对凡例所作的辨析也往往采用循名责实的方式,是行文所遵循的重要法度。

法度是在客观实践中生成的,在具体运用过程中,法度是准绳,同时又必须以事实为依据。方韬博士这部专著的行文法度,建立在充分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,贯穿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。综观方韬博士这部专著,是以坚实的考据为依托,绝大多数篇幅都是文献的梳理、对比以及语词的辨析,是一部实证型的学术专著。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在内证的运用方面得心应手,解决了一系列学术悬案和难题。关于《春秋经传集解》撰著的起始年代,以往的研究结果多是推测或怀疑之辞,无法落到实处。方韬博士的专著写道:“笔者以为从现存的外部材料已经很难考证杜预撰著《春秋经传集解》的具体时间,只有寻找到有力的内证才能有所突破。”基于这种想法,他选择杜预对地名所作的注释为切入点,最终得出如下结论:“至晚在晋武帝咸宁二年,杜预就开始了注释的工作。”这个学术悬案的研究,至此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。再如,他对《左传·僖公十五年》一段四十七字疑文所作的考辨,也是充分运用最有力的内证,最终通过对语词的辨析得出结论:“这段话极可能是为不谙《左传》文例者伪造。”内证充分,立论坚牢,这桩学术悬案也得到解决。方韬博士这部学术专著第三章第四节开头写道:

如果说,征引群籍是杜预注释《春秋》《左传》的外证法,那么,用《左传》来解释《左传》就是杜氏的内证法了。杜预极熟《左传》本文,故用此法更是得心应手。

这段话对杜预运用内证法所作的概括很准确。方韬博士的这部专著,同样大量运用内证法,而且卓有成效。运用内证法进行考辨,也是方韬博士这部专著的行文法度。

著述行文所遵循的法度必须以事实为依据,以文献为依托。然而,并非所有的文献都是真实可信的。这就提出从事著述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,就是要对所涉及的文献进行辨析,而不能盲目地相信、照搬取用。也就是

说，要有必要的怀疑精神。方韬博士的这部专著，不止一次地提醒人们，对于所依托的古代文献必须慎重对待，而不能掉以轻心。他在列举清人对《春秋经传集解》的错误判断之后指出：“也许清人的这种误会正是由于轻信了唐修《晋书》。”再如，关于西晋时期的学术走势，学界普遍认为是调和三传的倾向，即《公羊传》《穀梁传》《左传》的融合。对此，方韬博士在专著中指出：“此说可能并不全面，而这一判断可能基于《晋书·儒林传》，因此我们仍须对正史儒林传保持警惕。”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，不盲目地轻信古人，而是对所涉及的文献进行深入的辨析，去伪存真，是方韬博士著述行文所遵循的又一项法度。这种做法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。

中国古代及近现代学术经历了漫长的疑古阶段，许多典籍被判定为伪书。随着出土文献的大量面世，疑古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遏制。走出疑古时代，重写学术史，成为当下古代文史研究者的广泛共识。在这种学术潮流的主导下，又出现了另一种值得警惕的苗头，就是盲目地相信古人，把所有传世和出土文献的记载都作为信史看待。这种做法同样无益于学术研究，它的负面效应已经显露出来，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。学术研究不能怀疑一切，但是应该具有必要的怀疑精神，否则，很难对前人有所超越。方韬博士这部专著的求真务实，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怀疑精神。

杜预的《春秋经传集解》，有许多观念和解释与《公羊传》《穀梁传》等经学著作相异。方韬博士敏锐地觉察到这方面的问题，并且作出明确的揭示。然而，他的这部专著没有停留于此，而是进一步深入探索造成差异的原因。对于杜预的“经承旧史”说法，书中作出如下解说：“是其回归先秦《春秋》观的结果。同时，也可能受到出土文献和《穀梁传》的启发，并与西晋史学的发展密不可分。”对于杜预的以传附经，方韬博士也作了历史探源，按照以传解经、以注附经、以传附经三个历史阶段加以梳理，指出杜预对王弼的借鉴。杜预所建构的《左氏春秋》学，其继承关系模式是周公—孔子—左丘明。对于这种关系模式，方韬博士从古文经学的确立及魏晋政治两个层面加以解释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。总之，对于所涉及的重要问题进行追本溯源，是方韬博士这部专著遵循的又一法度。

学术研究的宗旨是求真，辨别是与非，解决是什么的问题。但是，如果只是走到这一步，那么，所作的研究仅仅完成一半。学术研究除了给出是什么的答案，还要进一步探索为什么如此，也就是要进行追本溯源，对于所出示的结论找出原因。只有走到这一步，学术研究才有可能有较大的深度和广度，使得所推出的成果给人以厚重感。而要解决为什么如此的问题，比给出是什么的答案具有更大的难度。原因和结果之间的联系，并非

总是显而易见，一目了然，而往往是若隐若现，甚至是处于隐蔽状态。原因要找得准确，合乎历史实际和逻辑上的因果律，避免牵强附会。所有这些在方韬博士的这部专著中处理得比较妥善，因此，没有流于表面现象的描述，揭示出一系列本质性、规律性的因素，有较大的深度。

方韬博士这部专著是实证型的，按照实证的理路进行操作，是这部专著总的法度。为这种实证型法度所决定，整部专著所作的探索基本都是从微观层面起步，而不是先作宏观审视，然后从微观层面加以印证。进行实证而从微观层面起步，可以说是古今学人能够获取创新成果的不二法门。综观方韬博士的这部专著的目录就可以发现，几乎每一节都是微观求证的相对独立的单元。多数节又对这个相对独立的单元进行更加细致的划分，落实到更加具体的微观部位。实证而从微观层面切入，是方韬博士这部专著的基本法度。

当下普遍追求学术成果在形态方面的“高大上”，争先恐后地申报各类重点项目、重大课题。不过，学术成果能否达到名副其实的“高大上”程度，不在于研究对象的大小，而是取决于研究的精深程度。即使选择的是“高大上”类型的研究对象，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蜻蜓点水，浅尝辄止，最终推出的只能是豆腐渣式的精神产品，或者是学术泡沫，文化垃圾。方韬博士的这部专著，分布在全书的数十个微观实证单元，犹如几十根植入地表深处的钢制支柱，撑起整部专著厚重的学术层楼，坚牢而不可动摇。究其原因，就在于这种运作法度合乎学术研究的规律。

微观层面的实证，属于专题研究，有利于做精做深。但是，把数十个专题研究单元组合在一起，是否会影响全书结构的合理、体系的严密？这是此种类型研究经常遇到的问题。方韬博士这部专著，妥善地处理了专题研究与全书结构、体系之间的关系，实现了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。他没有刻意建构完整庞大的体系，也没有预先设置强制性的结构，而是通过众多专题的有序排列组合，自然而然地形成合理的结构框架，完整严密的体系。他的成功秘诀，就在于专题研究的编排严格遵循分门别类、以类相从的原则，这是该部专著的又一项法度。清晰的类别划分，来自严密的逻辑思维。面对纷繁复杂的学术信息，能够做到条分缕析，充分显示出方韬博士缜密的逻辑思维。而逻辑思维的各项规定，乃是著述行文的基本法度。

从古到今，都把能否遵守学术规范作为判断研究成果的准绳。通常所说的学术规范，指学术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、法度，可以说是对学人的起码要求。而对那些有造诣的学者而言，他们不但遵守学术规范，而且能够创造性地加以运用，还可以创立具有本人特色而又合乎科学的规则、

6 杜预《春秋经传集解》研究

法度。如果确实能够走到这一步，那么他的学术就进入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境界。方韬博士这部专著，已经显示出他在方圆规矩之中从事学术研究的自觉性和创造性。相信他会再接再厉，更上层楼，成为新一代学者中遵循学理、运用学术法度的典范。

李炳海

2017年1月12日于扬州寓舍

目 录

绪论	(1)
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历代的研究简史	(1)
一 选题缘起	(1)
二 历代《春秋经传集解》的研究简史	(2)
第二节 杜预《春秋经传集解》研究现状	(4)
一 杜预生平与思想研究	(4)
二 杜预著述及《春秋经传集解》的整理与研究	(7)
三 《春秋经传集解》的语言文字学研究	(12)
四 《春秋经传集解》的经学研究	(14)
第三节 研究目标及相关说明	(21)
一 研究目标	(21)
二 相关说明	(22)

上编 经学编

第一章 杜预的生平与著述	(25)
第一节 杜预的家世、生平与交游	(25)
一 杜预的家世	(25)
二 杜预生平事迹考略	(29)
三 杜预交游考	(36)
第二节 杜预著述考	(41)
一 经学类著作	(41)
二 史学类著作	(45)
三 文学类著作	(48)
小结	(51)

2 杜预《春秋经传集解》研究

第二章 《春秋经传集解》的成书	(52)
第一节 《春秋经传集解》成书的背景	(52)
一 《左传》在三国时期的广泛流传	(52)
二 司马氏重视经学	(58)
三 魏晋时期《春秋》三传的融合	(62)
第二节 《春秋经传集解》辨名与撰著年代新证	(65)
一 “集解”辨名	(65)
二 撰著年代新证	(70)
第三节 杜预“分经合传”的编撰方式探源	(74)
一 引传解经	(74)
二 以注附经	(76)
三 以传附经	(77)
小结	(79)
第三章 《春秋经传集解》注释释例	(81)
第一节 字词训释例	(81)
一 训单字例	(82)
二 训双字例	(88)
第二节 诠释章句例	(92)
第三节 引书例	(100)
一 明引例	(100)
二 暗用例	(106)
第四节 引《传》注《传》例	(110)
一 明引例	(111)
二 化用例	(113)
第五节 校订文字例	(114)
一 校订文字的内容	(114)
二 杜预校订文字的方法	(116)
第六节 推校历日例	(120)
一 《经》文之误	(120)
二 《传》文之误	(125)
三 《经》《传》必有一误	(128)
四 《经》《传》皆误	(129)
第七节 发凡例	(130)

一 《经》《传》义例	(131)
二 《左传》体例	(134)
三 注释体例	(136)
第八节 征古证今例	(137)
一 征古例	(138)
二 证今例	(139)
第九节 阙疑志疑例	(145)
一 阙疑例	(145)
二 志疑例	(147)
第十节 前后会通例	(149)
一 阐明沿革	(149)
二 推源求解	(152)
三 重出互注	(154)
第十一节 注文详贍例	(157)
小结	(158)
第四章 杜预解经体例探析	(160)
第一节 杜预对《春秋》《左传》的基本观点	(160)
一 杜预的《春秋》观	(160)
二 杜预对《春秋》《左传》来源的解释	(165)
第二节 杜预对《经》《传》关系的解释	(169)
一 有《经》无《传》	(169)
二 无《经》有《传》	(173)
三 《经》《传》歧异	(180)
第三节 以《传》解《经》	(182)
一 以例解《经》	(183)
二 非例解《经》	(220)
第四节 杜预引《公羊》《穀梁》解《经》考	(222)
一 杜预明用《公羊》《穀梁》解《经》	(222)
二 杜预暗用《公羊》《穀梁》解《经》	(225)
小结	(236)
第五章 杜预“赴告”说、“旧史”说考辨	(238)
第一节 “赴告”说考辨	(238)

4 杜预《春秋经传集解》研究

一 “不告不书”说考辨	(240)
二 “从告”说考辨	(258)
第二节 “旧史”说考辨	(281)
一 《春秋》有不书,皆从旧史	(282)
二 《春秋》无义例,皆从旧史	(303)
小结	(313)
第六章 《春秋经传集解》经学史二题探微	(314)
第一节 杜预“周公作凡例”说探微	(314)
一 周公制作考	(315)
二 周公与《左传》凡例考	(317)
三 周公、周礼与魏晋政治	(320)
第二节 杜预注“五霸”说考	(324)
一 “三代五霸”事迹考	(325)
二 “三代五霸”说与《白虎通》	(327)
三 “三代五霸”说与汉末政治	(329)
小结	(332)

下编 文献编

杜预年谱	(337)
国图藏宋刊巾箱本《春秋经传集解》考论	(387)
传本《春秋经传集解》僖十五年质疑	(402)
敦煌本《春秋经传集解》补校	(410)
上海古籍版《春秋经传集解》点校商榷	(423)
《史记集解》引杜预注考校	(430)
《史记集解》所见《左传》古注浅析	(437)
吐鲁番残卷《左传》服虔注考释	(451)
从清华简《系年》看郤克与鞆之战	(459)
结束语	(471)
参考文献	(474)
后记	(485)

绪 论

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历代的研究简史

一 选题缘起

《左传》是儒家最重要的典籍之一。在传统经学领域，《左传》又是最富争议的著作。两汉时期，今古文两派围绕着《左氏》传不传《春秋》，是否当立于学官等问题，展开了三次激烈的交锋。最终，《左传》未被官方认可。东汉后期，今古文斗争的形势逐渐向着利于古文经的方向转变。曹魏之世，《左传》终立学官，至此，古文经也取得了对今文经的压倒性胜利。这时期《左传》的传播尤为迅猛，成为士大夫们必读的基础书。不过，《左传》与《春秋》的关系问题依然未决，仍给攻击《左氏》不传《春秋》的《公羊》《穀梁》学者以口实。因而，迫切需要建立起以《左传》为中心的《春秋》学，来进一步巩固《左传》的地位。

西晋初年，杜预（222—284）撰《春秋经传集解》（为求行文简洁，标题之外皆简称《集解》）三十卷，把原本单行的《春秋》与《左传》集合起来注解，建构出全新的《春秋左氏》学体系，解决了《左传》不传《春秋》的问题，成为《左传》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。东晋南朝时期，《集解》立于学官。而北方《左传》服虔注仍盛行。唐初孔颖达为《集解》作疏，成《春秋正义》三十六卷^①。自此结束了《左氏》学南北分裂的局面，杜氏注成为解释《春秋》的权威。

然而，《集解》从问世起，批评和质疑就未绝于耳。南北朝时期曾出现过反杜高潮，而反对的声音在清代达到顶峰。但《集解》经过历史的洗

^① 南宋以来多将注疏合刻，先有宋庆元六年（1200）绍兴府刻八行本《春秋左传正义》三十六卷，后有南宋建安刘叔刚刻附释音《春秋左传注疏》六十卷，此后六十卷注疏本成为最通行的《左传》注疏本。

2 杜预《春秋经传集解》研究

礼，价值日益彰显。今天，我们重新研究《集解》，当力避前人之失。具体言之，即在评论杜注优劣得失前，应准确把握《集解》的基本内容。因此，立足于考析基本文献，再结合经学史上的重要问题，对《集解》展开全方位的探究，是为本书撰述之缘起。

二 历代《春秋经传集解》的研究简史

《集解》诞生之初，并未引起时人的瞩目。西晋太康年间，文风日趋绮丽，《集解》《春秋释例》（以下简称《释例》）因文义质直颇受轻视，唯有挚虞认为“《释例》所发明何止《左传》”，其书必传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《集解》愈受重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《春秋经传集解序》（以下简称《春秋序》）仅晋一代就有刘寔、干宝、徐邈三人为之作注。在南朝，刘宋有明僧绍、贺道养，梁有崔灵恩、田元休，陈有沈文阿先后为《春秋序》做解。北朝亦有乐逊、刘炫等四家注释。一时间，研究《左传》杜氏学蔚然成风。

然而，今人论及南北朝《集解》的接受史，多以《隋书·经籍志》和诸家史书的《儒林传》为据，事实上很难揭示杜注接受的真相。笔者以为，《集解》是《左传》的注解，那么应当从注释文献及历代的使用状况中求之，方能求得真实。以东晋南朝为例，晋范宁《春秋穀梁志集解》、宋裴骃《史记集解》、梁刘孝标《世说新语》注、梁刘昭《续汉书志》注、梁顾野王《玉篇》（原本残卷）皆曾引用杜注。笔者粗略统计，《穀梁集解》引13条^①，《史记集解》引279条，《世说新语》注引5条，《续汉书》注引276条，原本《玉篇》残卷引近200条。此外，北魏酈道元《水经注》征引杜预注114条^②。由此可知，杜注见诸南北朝注释文献者夥矣。重新考察各种文献中贾逵注、服虔注与杜预注的消长，并对所征引杜注的内容做分类考析，也许可以更细致地描述这段学术史。还有诸如《集解》“义例”对六朝史例的影响，杜预礼学在南北朝引发的争议，等等，都是颇有价值的课题。

隋唐时期，经学逐渐走向统一。陆德明撰《春秋左氏音义》即以杜预注为底本，唐贞观年间（627—649）孔颖达等撰《春秋正义》亦专主杜注，并确立了“疏不破注”的原则。永徽四年（653），《五经正义》颁布天下，自此杜注独享《春秋左传》的解释权。从稍后《文选》李善注的征

^① 此仅为范宁标明“杜预”姓氏的条目，至于暗引杜注者远多于此。

^② 此数目包括杜预《春秋经传集解》与《春秋释例》。

引来看，杜预注占绝大多数，贾逵注、服虔注寥寥数条，趋于亡佚。中唐时期史学研究兴起，刘知幾《史通》是为代表作。杜预“以传解经”、“经承旧史”的思想对刘氏影响很大，可以认为《惑经》《申左》诸篇是杜预思想的深化与拓展。唐中后期，学术思想发生巨变，舍传求经成为一时潮流。此风实开宋学之先河，得力者是啖助、赵匡、陆淳三人。陆淳《春秋集传纂例》批评杜预以《春秋》为周公之志的观点，语调相当严厉。事实上，陆氏此说也确实击中杜预等古文经学家的要害，具有某些思想批判的意味。晚唐刘蕡为杜预《春秋释例》作序，认为杜预述凡例“意欲安中国而御四夷，释权义以正礼经”，其实是刘氏委婉表达对晚唐政局的忧虑。五代时期冯继先作《春秋名号归一图》二卷，完善了杜预的《春秋氏族谱》。

宋代继承中晚唐的学风，刘敞《春秋权衡》力主以《春秋》衡三传得失，对“以传疑经”的杜预注多有责难。南宋时期魏了翁辑《九经要义》，其中有《春秋左传要义》三十一卷。该书释义以杜预、孔颖达为主，驳斥服虔、刘炫，其维护杜注的立场在宋代实为罕见。

元明两代的《左传》杜注研究略逊于赵宋。不过，元代黄泽、赵汭的研究却颇有亮色。赵汭撰《春秋左氏传补注》，针对杜注的不足，广采先秦古籍，并大量吸收宋人的成果，用力甚勤，诚有功于杜氏。明中期的傅逊也值得瞩目。其著有《春秋属事》和《春秋左传注解辨误》《补遗》，实为清代纠杜之先声。其书兼顾义理、训诂，于杜注商榷甚多。

清代小学大明，顾炎武为开山宗师。顾氏撰《左传杜解补正》三卷，遂引领一代纠杜的潮流。嗣后，有朱鹤龄《读左日钞》十二卷，惠栋《左传补注》六卷，齐召南《春秋左传注疏考证》二卷，梁履绳《左通补释》三十二卷，张聪咸《左传杜注辨证》六卷，马宗琯《春秋左传补注》三卷，沈钦韩《春秋左氏传补注》十二卷，丁晏《左传杜解集正》八卷，廖平《左氏春秋杜注集解辨证》二卷，章太炎《春秋左传读》等一系列以规正杜预注为目标的力作。清人由起初不满杜注的内容，逐渐发展到否定杜预的为人。焦循《春秋左传补疏》把杜注的内容与杜预的立身行事结合起来，着力发掘《集解》义理的荒谬处。焦氏痛斥杜预为其父杜恕之不肖子，《春秋》学之蠹贼。清人在否定杜注的同时，欲复汉注之旧。洪亮吉《春秋左传诂》把《左传》和《春秋》恢复到杜预之前经、传分立的状态，并将杜注与汉注的沿袭关系逐一指明。清儒最终的目标是欲建立以汉注为主体的《左传》新注疏来取代杜注孔疏。李貽德《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》二十卷和刘文淇等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是这种努力的代表。晚